

改革开放以来 汉语旧词新义研究

宋培杰 著

GAIGEKAIFANG YILAI
HANYU JIUCI XINYI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改革开放以来 汉语旧词新义研究

宋培杰 著

GAIGEKAIFANG YILAI
HANYU JIUCI XINYI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革开放以来汉语旧词新义研究 / 宋培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 - 7 - 5203 - 0574 - 7

I. ①改… II. ①宋… III. ①现代汉语—词语—研究
IV. ①H1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160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刘 艳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5
插 页 2
字 数 239 千字
定 价 7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对象	(1)
一 问题的提出	(1)
二 旧词新义的内涵	(3)
三 旧词新义的不同层面	(7)
四 旧词新义的属性	(8)
第二节 研究综述和语料来源	(9)
一 研究综述	(9)
二 语料来源	(13)
第三节 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14)
一 理论基础	(14)
二 研究方法	(16)
第二章 旧词产生新义的类型	(19)
第一节 词义的一般类型和存在方式	(19)
一 词义的一般类型	(19)
二 词义的存在方式	(27)
第二节 旧词产生新义的类型	(31)
一 旧词改变原义	(32)
二 旧词增添新义	(46)

第三章 旧词产生新义的表现	(72)
第一节 专用词语的语义泛化	(72)
一 专用词语语义泛化的内涵	(72)
二 专用词语语义泛化的表现	(75)
三 专用词语语义泛化的等级	(82)
四 专用词语语义泛化的机制	(88)
五 专用词语语义泛化的社会功能	(92)
六 专用词语语义泛化的特点	(103)
第二节 历史词的复现	(108)
一 历史词复现的内涵	(108)
二 历史词复现的原因	(110)
三 历史词复现的方式	(113)
第四章 旧词产生新义的主要方式	(121)
第一节 隐喻衍生	(121)
一 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观	(121)
二 隐喻衍生的过程	(123)
三 隐喻投射的方式	(125)
第二节 转喻衍生	(127)
一 认知语言学的转喻观	(127)
二 词类转化的转喻阐释	(132)
第三节 意义移植	(151)
一 意义移植的内涵	(151)
二 意义移植的条件	(153)
三 意义移植的类型	(156)
四 意义移植的影响	(159)
第五章 旧词产生新义的原因	(162)
第一节 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	(162)
一 新事物的涌现	(162)

二	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	(164)
三	大众传媒的推动	(165)
第二节	词义系统内部的调整	(167)
一	同义义场的语义联动	(168)
二	反义义场的语义联动	(170)
第三节	语言表达需求的推动	(173)
一	语言表达中“求便”需求的推动	(173)
二	语言表达中“求新”需求的推动	(174)
三	语言表达中“求简”需求的推动	(175)
第四节	语言接触中外来词义的影响	(178)
第六章	网络语言中的旧词新义	(181)
第一节	网络语言中旧词新义的内涵及特征	(181)
一	网络语言中旧词新义的内涵	(181)
二	网络语言中旧词新义的特征	(182)
第二节	网络语言中旧词产生新义的方式	(184)
一	隐喻	(184)
二	转喻	(188)
三	谐音	(190)
四	别解	(192)
五	翻新使用古汉字	(196)
第三节	网络语言中旧词产生新义的原因	(198)
一	网络交流形式的特殊性	(198)
二	网络交流主体的特殊性	(199)
附录		(202)
参考文献		(267)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对象

一 问题的提出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的社会变革，都会在语言里留下深刻的印记。被邓小平称作“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开放，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远非以往任何一场社会变革所能相比，因此它给汉语带来的影响也是空前的，这主要表现为：它不仅催生了一大批新词新语，而且还使不少旧词产生了新义或固有语法功能发生了变化。在词汇的这些发展变化当中，其中一种情况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旧词新义。旧词新义是旧词形增加新意义的一种词汇现象，它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不创造新词形，而是通过变化或扩大原有词语意义的方法来满足人们表达新概念的需要。例如，“眼球”原来表示“眼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意义，但现在又衍生出新义，借指“注意力”；“化缘”原本表示“僧人或道士向人求布施”，后来发展出新义，比喻“单位或个人到处筹集资金、求取物资”。很显然，旧词新义是利用语言中的固有词语来负载新义，这是在不增加词汇总量的前提下，有效扩展词义容量的一种手段，因此它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与成千上万拥有新词形的新词语相比，旧词新义的数量要少得多，但它们一旦在语言生活中立足，其生命力往往会比某些新词要强得多，因此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广泛关注。据统计，近三十年来，

出版的有关旧词新义的词典已达二十多部, 论文也有数百篇。虽然目前见到的有关旧词新义研究的专题性论著不多, 但讨论个别词词义发展变化的文章却有不少, 比如《“防火墙”新义新解》《“打造”的新义新用法》《“盘点”新义》《流行词“杀手”的语义变化》《说“炒”》《“跳槽”考辨》《说说“洗牌”》《“叫板”的引申义》《释“酷”》《小议“瘦身”》《“蒸发”的非本义用法》《浅析旧词新义“纠结”的用法》等。这些单篇论文虽然零散独立, 但却为我们系统深入地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汉语的词义发展变化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

在语言的诸要素中, 因为词汇与社会的关系最为密切, 所以可以从词汇的发展变化窥视社会生活的变革, 这正如陈原先生所言, “语言中最活跃的要素——语汇, 常常能敏感地反映社会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语言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如何息息相关, 这就是语言学的新领域, 也就是社会语言学的领域, 我们在这种研究中, 即从语言现象的发展和变化中, 能够看到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①。因此社会语言学中的相关理论为我们讨论改革开放以来汉语词义变化的外部动因提供了理论基础。不仅如此,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也陆续被引介到国内, 学者们纷纷借鉴其中的隐喻和转喻理论来观察汉语词义发展变化的方式, 解释多义词词义之间的衍生关系。这些理论较之前训诂学中词义变化模式理论有新的突破, 可以为我们解释改革开放以来汉语词义变化的内在机制提供理论支撑。

我们以旧词新义为切入点, 目的是要深入探讨改革开放以来汉语词汇的变异现象。词汇变异在人们的言语交际过程中产生, 并与我们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因此对汉语词汇的变异进行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和社会应用价值, 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 它有

① 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 第1—2页。

利于推动汉语语言学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同时,也会为汉语辞书的编纂提供选词依据。第二,语言的发展演变离不开词汇变异,对词汇变异进行研究,探讨词汇变异与语言发展演变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科学地揭示语言的发展规律,认识语言的本质。第三,词汇变异是词汇成分在特定语境中的变异,它有健康、积极的成分,也有不健康、消极的成分,通过对词汇变异形式、特点及其诱因的探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人们正确使用汉语,从而有助于促进汉语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第四,词汇变异既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当前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和观念心态,以及社会思想文化的特点与发展变化。基于此,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汉语旧词新义研究具有深刻而丰富的语言学和社会文化意义,它对填补和充实现代汉语研究和社会语言学理论有一定的价值。正是基于以上实践要求和理论思考,我们提出了旧词新义研究这一论题。

二 旧词新义的内涵

自吕叔湘先生1984年在《辞书研究》第1期上发表了题为“大家来关心新词新义”的文章之后,新词新义就成为当今汉语词汇学研究的主要热点之一。而旧词新义作为新词语的一部分,自然也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旧词新义”即旧词产生新义,如前所述,它是一种用旧词形表示新意义的词汇现象。为进一步弄清楚“旧词新义”的内涵,我们可以从符号学的角度来加以阐释。如果着眼于符号的或所指或能指任意一种要素的“新”,能指的新与旧和所指的新与旧两两配合,就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新词形兼新词义,即利用汉语的构词材料和造词方式创造了一个新词形,而这个新词形表示的是一个新概念。例如,自从湖南卫视推出了《百变大咖秀》这一档娱乐节目以来,我们的语言生活中就以“咖”为共同语素产生的一大批新词,如“夜店咖”

“玩咖”“烂咖”“综艺咖”“大咖”等。

第二种是旧词形增新词义,即“遵循旧瓶装新酒的方式,不产生新的形式,而是依附于原有的词语,采用扩大或变化原有词义的办法来实现”^①。例如“包装”原本是指“商品外面用纸包裹或把商品装进纸盒、瓶子等”,包装的对象仅限于“物品”,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它也产生了新义,即“一些唱片或影视公司为获取高额回报对其所属的歌手或演员进行形象风格的定位设计并为之创造各种外部条件使他们走红”,很显然,“包装”一词的指称范围明显扩大,演艺人员的一切风格设计、穿着打扮、技能学习等都可以被称作“包装”。

第三种是旧词义换新词形,即重新创造一个词形来表示词义系统中本来就存在的一个概念。例如,“大哥大”原是一个社会方言词,最先用来称呼黑社会的头领,后来借指“移动电话”。这个词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曾盛极一时,但后来由于移动式通信工具变得日益普及,并且越来越平民化,再加上“大哥大”这种称呼本身具有炫富的俚俗气这一负面效应,所以人们就新创了一个更为平实的新词——“手机”来代替了它。很显然,“手机”这个词的形式是新的,但理性意义却与“大哥大”这个旧词并无两样。

这三种词汇现象尽管都包含了新的要素,但本质是不同的。第一种情况和第三种情况都产生了新的词形,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新词新义”和“新词旧义”,而第二种情况是指语言中的固有词语衍生出来新的意义或原义发生变化,与另外两种情况相对应,我们称之为“旧词新义”,而本文所要讨论的就是这一现象。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产生新用法的固有词语也应属于旧词新义的范畴,虽然这类词语的语音形式和结构形式是固有的,甚至它们的词汇意义也没有变化,但在具体运用中其组合关系却发生了变异。例如,某些动

① 李行健:《“新词新义”仍需关注》,《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宾式动词像“挑战”“亮相”“登陆”等后面一般不接宾语，但在改革开放以来，这类词语后面跟宾语的用法变得十分常见，如“挑战不可能”“亮相广州”“登陆荧屏”等。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旧词新义”，我们有必要先弄清楚“旧”和“新”的内涵。“旧词”和“新词”是相对而言的，判定它们必须考虑时间因素。也就是说，“新词”和“旧词”的界定涉及一个时间参照问题，它们的区分总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坐标下进行。比如，如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9）为时间参照的话，那么在此之前产生并一直使用着的就是旧词，反之，在此之后陆续出现并一直稳定地使用到今天的就是新词。因此，本文在界定“旧词新义”这一内涵时，也选定了一个时间参照，即改革开放之始，具体来说是以1978年为界。为什么要如此呢？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开放开始之时是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旧词新义持续高幅增长的起点，另一方面还因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开展的与新词有关的整理和辞书编纂工作，多是以1978年以来新出现的词语和意义为对象的。基于此，本文把改革开放之前出现的词语称为“旧词”，以与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新词（利用汉语固有语素和造词方式创造的新词或直接从别语言里借用来的新词）相区别。具体来说是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版）为参考依据，认为凡是被该词典收录的词应算作旧词。之所以这样判定，一方面是因为这部词典收词相对全面，所收条目涵盖了词素、词、词组、熟语等56万余条，是改革开放开始之时国内完整出版的收录现代汉语词汇最多的一部词典；另一方面在于这部词典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它发行量大、影响广泛，因此以该词典中所收录的词为依据来判定旧词是比较科学的。但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受词典规模、性质的限制，有些旧词可能没有作为词条被1978年版《现代汉语词典》所收录，但我们通过语料证实了它们在改革开放之前就一直存在并使用着，所以这些词也应属于本书的研究对

象。所谓的“新义”是指某些旧词改革开放以后新产生的意义，其主要依据是1983年版、1996年版、2005年版、2012年版《现代汉语词典》以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出版的一些新词词典中所收录的义项。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把1978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分别与1996年版、2005年版、2012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进行对比，结果发现词典中的新增义项有“漏义”和“新义”两种情况。“漏义”指的是1978年版《现代汉语词典》定稿时某词已有的本该收录却失收的意义，比如，有些词因为补充古义而增加义项，这类词多会以“〈书〉”作标志；有些是因吸收简称而增加义项；有的是因补充异体字或“姓氏”义而增加义项。很显然，“漏义”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为了尽可能地排除“漏义”，最大限度地搜集有关旧词新义的词例，我们参考了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中的一些典范用例，并进行了认真的比较分析。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有些旧词在改革开放以后产生的新义，虽然还没有被相关的词典所收录，但已经得到了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所以也将其视为本书的研究对象。

本书所说的“旧词新义”实际上包括了两种，一种是旧义和新义之间有严格的源生关系，即新义是从旧义派生出来的，两者之间存在共同的语义因子。例如，“软着陆”原指“人造卫星、宇宙飞船等利用一定装置，改变运行轨道，逐渐减低降落速度，最后不受损坏地降落到地面或其他星体表面”。后来人们将“飞行器飞行状况”与“经济运行情况”进行类比，在“平稳降低”这个意义上把“软着陆”移用到经济领域，使它在专业语义的基础上又衍生出新的意义，产生了“经济运行状态较平稳地下降或经济增长势头逐渐回落”这一新义，很明显，它的新旧意义中都包含了“逐渐平稳降落、不受损坏”这一共同的语义成分。另一种是旧义和新义之间没有源生关系。例如，“稀饭”原指“用米或小米等煮成的粥”，网络语境产生了新义，表示“喜欢”；“讨厌”原指“厌恶、惹人心烦”，网

络新义表示“讨人喜欢，百看不厌”。很显然，这些新旧意义之间没有共同的语义因子，属于非源生关系。

三 旧词新义的不同层面

改革开放以来的旧词新义是一个范围较广的集合体，从新意义的存在形式、使用时效、应用范围等方面来考察，其实它们并不属于同一个层面。大致说来，它可以分为以下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包含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旧词新义。语言是一个变动不居而又大致持衡的系统，新词新义不断产生，旧词旧义逐渐消亡变化。这里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旧词新义”，正是以动态的发展变化为视角，以语言原有的词义系统为参照系进行审视的结果。这个层面的旧词新义是泛时的，因此涵盖面广而又不可穷尽。它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涌现，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之中。有的可能逐步扩大使用范围，被广大社会成员所认同而进入共同语；有的可能就是昙花一现，在某一交际场合曾经传递了新的信息；有的也可能只是在某一语境中产生并一直发挥作用，但在该语境之外的其他场合却鲜有用到。

另一个层面包含的是规范化了的、已进入到民族共同语的旧词新义。某些旧词新义因适应了语言交际的需要而迅速扩大使用范围，并逐渐发展成为民族共同语的一员。与一般意义上的旧词新义相比，这类旧词新义具有明显的“广用性”和“频用性”的特点。“广用性”是指旧词产生的新义为社会各个阶层所广泛使用，“频用性”是指旧词产生的新义有比较高的使用频率。正是基于此，所以该类旧词新义会被规范性辞书当作一个新的义项收录。

这两个层面的旧词新义，从概念的外延来说，一般意义上的旧词新义大于规范化的、已进入到民族共同语的旧词新义，但从使用的时效性来看，却正好相反，一般意义上的旧词新义，是语言绝对变异性的表现，也是规范化了的、已进入到民族共同语的旧词新义

赖以产生的土壤，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规范化的、已进入到民族共同语旧词新义是对一般意义上的旧词新义评判、抉择的结果，是语言相对稳定性的一种表现。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层面的旧词新义有时并非泾渭分明，它们之间往往互相交错，我们必须待以时日，方能分辨其本色。正确认识不同层面的旧词新义，并以不同方式去处理它们，这是编纂不同类型的新词词典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

四 旧词新义的属性

关于“旧词新义”的属性，目前语言学界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它属于新词语一部分。向超（1952）曾经指出，“新词并不单指新造的词。构成新词有四种方式……其中第二种就是赋予旧词以新的意义和新的用法”^①。赵克勤（1988）认为：“怎样给新词语下定义？……新词的不断产生，旧词的不断死亡，这是发展变化的一个方面；新义的不断产生，旧义的不断死亡，这是发展变化的另一方面。因此，新词语不应该仅仅限于新词形，也应该包括旧词形所包含的新意义。”^②很显然，赵先生明确地将“旧词新义”列入了“新词语”的范围。王铁昆（1992）也认为“新词语是指一个新创造的或从其他语言中，从本民族语言的方言词、古语词和行业语中新借过来的词语，也指一个产生了新语义、新用法的固有词语”^③。陈原（1997）同样也把旧词新义归入了新词语，他认为：“新词语包括新的词语、新组合的、新引进的、或者是旧词语复活，或被赋予新语义。”^④另一种认为它不属于新词

① 向超：《关于新词和新义》，《语文学习》1952年第1期。

② 赵克勤：《论新词语》，《语文研究》1988年第2期。

③ 王铁昆：《新词语的判定标准与新词新语词典编纂的原则》，《语言文字应用》1992年第4期。

④ 陈原：《关于新词语的随想》，《语文建设》1997年第3期。

语。国怀林（1992）曾指出：“如果把所有产生了新义的原有词语都算作是新词语，无疑将新词语的范围扩大了……”^① 徐国庆（1999）同样认为：“若仅就‘新义’而将‘旧词新义’归入‘新词’的行列，是不应该的，是很危险的。”^② 盛林（2003）也持有相同的看法，“旧词新义是旧有词的词义发生语义运动，在原有词义基础上产生的相近语义。……所谓新义实际上只是原有词语的一个新的义项而已”^③。

对于“旧词新义”的属性，我同意前一种观点。因为词作为语言符号，是形式和意义的统一体，所以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新”，都可以作为判定新词的重要依据。如前所述，旧词新义是旧词形承载了新意义，也就是说，对于产生了新义的旧词来说，它的形式虽然是旧的，但意义却是新的，因此我们认定旧词新义属于新词语。照此说来，从词形的角度来看，新词语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全新词形的新词语，另一类是词形没有变化的新词语，赋予新义的旧词就属于不创造新形式的新词，这样处理，就避免了用单纯的形式标准来判断新词而造成的片面性。通过创造新词形固然是新词产生的一个重要途径，但一味地增加新词形势必会加重人们记忆的负担，因而相比之下，赋予旧词以新义可以说是一种更为经济实用的创造新词语的方式。

第二节 研究综述和语料来源

一 研究综述

如前所述，旧词新义属于新词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就目

① 国怀林：《论新词语的确定》，《语言学论辑录》第2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

② 徐国庆：《现代汉语词汇系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

③ 盛林：《辞书的修订与创新》，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6页。

前新词语的相关研究成果而言,旧词新义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这主要表现为探讨旧词新义的专题性成果较少,已有的大都是将其当成新词语的一类顺便提及,倾向于跟新词语熔为一炉进行全盘研究。这正如周洪波在《近年来汉语新词语研究的进展》一书中所言,“现有的新词语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新词的研究上,新义研究很少,新用的研究几乎是空白”^①。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现状并不利于对旧词新义进行全面系统的深入挖掘。

虽然目前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旧词新义的专著并不多,但进行个案分析的文章却有不少,综合起来,这些研究主要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关于旧词新义的范围问题。哪些属于旧词新义,目前语言学界对此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看法,广义的旧词新义既包括新旧意义之间有源生关系的,也包括新旧之间没有源生关系的。如李亚军(2000)认为旧词表达新义“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新义是以原词的词义为基础而产生的,另一种是新义与原词的词义没有关系,只是依托了原词的词形。两者的共同之处为旧词形负载新意义,不同在于新义的派生式产生与非派生式产生。这两者都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从结果上说,新义不管是以哪种方式产生的,都表现为义项的增加”^②。黎昌友(2009)认为“网络语言的旧词新义中新义与旧义的关系有非源生和源生两种形式,前者是借用旧词形负载新义,新义与旧义毫无联系,后者是在旧义的基础上派生出新义”^③。狭义的旧词新义只包括新义与旧义之间有源生关系的。如任妍晖(2010)认为“旧词新义属于现代汉语词义系统内部的变化,是新

① 周洪波:《近年来汉语新词语研究的进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8页。

② 李亚军:《九十年代以来旧词新义探析》,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00年,第3页。

③ 黎昌友:《网络语言旧词新义中新义与旧义之间的关系》,《社会纵横》2009年第8期。

词语中较为特殊的一类,具体来说,是指词义系统中同一个词形在原有常用意义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的意义,且这一意义已经相对较为稳定地在语言交际中流传与使用开来”^①。曾柱认为“如果新义与词形表示的原有意义没有明显联系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联系,那么我们可以说是新词语,不过这不是‘旧词新义’而是‘同形新词’了。以上两种情形应作区分”^②。

第二,关于旧词产生新义的原因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旧词产生新义的原因,如刘剑三(1996)认为新时期固有词语产生新义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新事物的出现;二是人们认识的演化。申雅辉(2000)认为社会的发展、人们观念的变化、言语主体创造性地运用、心理活动中的联想机能等因素可以促使旧词产生新义。熊可嘉(2007)认为新事物、新现象的涌现是旧词产生新义的根本原因,而社会心理的变化是旧词产生新义的重要因素。吴亮(2006)认为社会生活的发展、人们思想意识的发展分别是旧词产生新义的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

第三,关于旧词产生新义的方式或途径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旧词产生新义的方式,如申雅辉(2000)认为“旧词产生新义的方式主要是引申和修辞,此外,重解合成词中的语素义、改变词的感情色彩、改变词性,也能使旧词产生新义”^③。武稀楠(2008)把旧词产生新义的途径归纳为喻指、引申、替代、搭配及其他。姚柏舟(2014)认为词义引申、构词歧异和外来词“套译”是旧词形融入新词义的主要方式。这些研究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词形为基点描述词义的变化,另一类是以词义为参照去反观词形的选择,两类研究互为补充,大致勾勒出了旧词产生新义的途径或方

① 任妍晖:《新媒体语境下的旧词新义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2010年,第3页。

② 曾柱:《旧词新义与新词语词典编纂相关问题浅议》,《辞书研究》2011年第3期。

③ 申雅辉:《旧词新义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00年,第11页。